

梁启超

启蒙思想研究

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者

之古书，世界莫能及。……于戏！

于戏！佛大哉我国民！他又说：

蛇生焉。取精复而用物宏而魂魄强

之国，至伟大之国民，其学术思想

，又岂限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直

夷，所能梦见者？故合世界文通

国者，谁乎？我中华也。四百余年

中兴，我中华也。人口



三
中
人
国
分
之
一
启
蒙
思
想
研
究

焦润明著

肯定了中国先人的文化创造
新了中国先人的文化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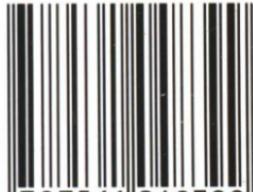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常江

黄铮

封面设计 本忠

ISBN 7-5610-4839-4



9 787561 048399 >

ISBN 7-5610-4839-4 / 定价：20.00元

焦润明 著

梁启超
启蒙思想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

©焦润明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启蒙思想研究/焦润明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610-4839-4

I. 梁... II. 焦... III. 梁启超 (1873~1929) —
思想评论 IV. B25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748 号

责任编辑：常江 黄铮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齐悦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0mm×203mm 印张：10.75
字数：25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目 录

导论：“西力东渐”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基本态势	1
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历史前提.....	1
二、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展.....	9
三、梁启超在近代思想启蒙中的历史地位	22
第一章 中日启蒙思想的异同	29
一、两国启蒙思想产生的条件相同	29
二、两国启蒙思想的出发点相同	33
三、两国启蒙思想的差异性	38
第二章 由传统转向西学中的觉醒	41
一、初次接触西学的震动	41
二、海外游学与启蒙	48
第三章 面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	59
一、充满爱国内容的危机意识	59
二、以“自变”顺应变局	64
三、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危机意识之比较	68

第四章	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的思考	71
一、	西方科学文化与东方儒学文化的差别	71
二、	西方立宪与东方专制的差别	82
三、	西方独立自由与东方受治服从的差别	94
第五章	关于新文化的构想	105
一、	中国文化之再造希望	105
二、	“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	113
三、	“淬厉其本有”与“采其所本无”	119
第六章	“新民德”的启蒙思想	124
一、	培养公德之大目的在“善群”“利群”	124
二、	利己与爱他：肯定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129
三、	提倡“独立之德”、“合群之德”与爱国	132
四、	个人权利：确保国家独立的基石	136
五、	自由为“精神界之生命”	138
六、	“新民德”的价值及作用	141
第七章	“开民智”的启蒙思想	150
一、	“智”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	150
二、	“开民智”的途径与方法	157
第八章	“鼓民力”的启蒙思想	170
一、	弃“忍让”崇“尚武”	170
二、	禁陋习 健体魄	178
三、	“劝业”与富民	182

附录：研究论文	185
论梁启超的文化选择观.....	185
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运作与思想启蒙.....	228
梁启超的文化思想.....	244
梁启超的日本观.....	259
梁启超的孔子观.....	275
梁启超对“三权分立”学说的研究与介绍.....	284
论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298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321
后记.....	336

导论：“西力东渐”与中国近代思想 启蒙的基本态势

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历史前提

1. 近代启蒙的历史内涵

启蒙，这个词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具有启发人类无知蒙昧的意思，也就是指使人们从无知到有知的行为，如启蒙教育、启蒙读物、开蒙教材等等。但是，我们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使用时，启蒙则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空又有着特定思想内容和含义的思潮。1784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发表了《什么是启蒙，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一文，对于启蒙这一问题作了清晰透彻的解释，他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这种不成熟状态，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没有别人的指引就缺少决心和勇气去应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箴言就是——

敢于明智，大胆地运用他自己的悟性。”^① 启蒙，实质就是开蒙，指先觉者对不觉醒者的提示、开导和唤醒。从社会层面上看，当社会发生重大社会变迁之前，总会有一批先觉者敏锐地感知到了社会变迁的种种先兆，并利用已知的知识来推断出这些征兆所代表的意义，先觉者们把这些社会征兆的意义告诉给那些未觉者们的行为就是“启蒙”。

启蒙作为一种在人类认知层面上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各个领域中。不过，作为某一特定时代的思想启蒙形式，却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时代内涵。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启蒙，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向，以理论学说形式体现出来的思想启蒙，往往能够站在时代前沿，反映着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们，用自己的学说、理论和思想来唤起民众的时代觉醒，认识时代的特点，指引着民众前进的路向，从而在人类的思想历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近代思想启蒙除具有人类历史上思想启蒙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它显著的时代性——“近代性”特点。即近代思想启蒙是发生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夜及其过程中，代表着新社会的基本趋向。17世纪以来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就是近代思想启蒙最典型的表现。17世纪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最前列的尼德兰和英国，启蒙思潮表现得最为活跃，一批先觉思想家批判旧社会制度的陈旧和腐朽，揭示新社会的内在活力和它对人类自身的意义。因而他们所阐述的理论也多集中在理性、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社会契约等方面，通过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批判，进而阐释适应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行为方式，唤醒广大民众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① 引自《哲学译丛》，1991年4期，第3页。

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密尔顿、霍布斯和洛克等是 17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18 世纪在封建制度没落的法国又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毕封、卢梭、博马舍等人，他们的思想更加深刻、更加具体。他们不仅继承了 17 世纪启蒙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对未来社会的制度、人权保障，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都做了具体的理论探索，为进入近代社会做了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

概括地讲，近代启蒙主要是指 17 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启蒙思潮”。这一启蒙思潮首先在 17 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英国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在 18 世纪初波及到法国，然后到德国，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波及到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从欧洲地区波及到亚非拉美诸国。

近代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憧憬建立“理性的王国”，他们把封建制度比作漫漫长夜，呼吁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消灭专制主义、封建特权和不平等现象，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总括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启蒙思想，无论在哪国，都含有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蒙昧（黑暗）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表明着这样一种思想意识：把中世纪封建社会看成是蒙昧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反，他们把自己努力所推崇、建构的时代夸耀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光明时代。这自然是当时新兴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其实质上反映了与近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成长、壮大直至挑战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这点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因为他看来，人类的未成年的状态的责任是人类自己，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得依靠自己积极主动地运用人类的“悟性”和“理性”。显然，康德是自觉地以近代人的形象和思维方法作为启蒙的基础的，这与古代人和中世纪人的

形象和思想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呼唤理性，崇尚科学文化，阐发自然神论或公开的无神论世界观，批判封建专制的蒙昧主义——提倡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启蒙运动所贯穿的主题。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是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催化下发生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自由、民主、平等、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尊，其目的也是为建立近代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只是由于中国处于从属奴役的地位，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也成为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实质上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扩散或在东方转型国家中的重演。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同属于近代启蒙思想范畴。

2. 西方征服与从属资本主义的确立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崛起，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进行征服世界的活动。工业革命和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和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改变了它与封建势力的力量对比。随着一批大国跨入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各国对全世界的征服活动也加强了。它们在征服过程中既给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又将资本主义的因素带到了所有被征服地区。这样，通过若干国家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各地大片土地的征服这样两条基本途径，全世界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浪潮。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于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初步形成。

1840年，真正代表着近代资本主义势力的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在长矛大刀等冷兵器与铁甲巨舰、坚船利炮等“热兵器”的艰苦较量中，清王朝屈服，

被迫与英国（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也是近代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走向半殖民地的重要标志。《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在广州继续谈判，于1843年7月和10月先后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接着美、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同年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侵入中国的大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鸦片战争之后没有立即解体，加上在体制上又妨碍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内部的渗透，在文化上清政府官僚和士大夫“夷夏之防”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地要求英国政府再次发动对华战争，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法国资产阶级也渴望扩大殖民市场，强烈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这样，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契机，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和沙皇俄国则支持英、法的侵略。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正式爆发至1860年11月结束，历时四年多。战争仍然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失败的极其惨烈——京城被占，财富被掠，圆明园被烧，同时又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以《北京条约》为标志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清王朝时代的中国又丧失了更多的主权。总之，两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阶段，它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逼迫中国被迫走上“从属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其重要标志就是“不平等条约制度”的确立。

中国通过西方列强逼签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量

主权：（1）丧失领土主权，中国有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割占；（2）丧失关税自主权，丧失了大门的钥匙，海关被外国列强的代理人长年控制；（3）“利益均沾”的好处原则，这项条款几乎成为不论大小强弱的国家，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必具条款，成为列强无限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敲门砖；（4）引水权和军舰驻泊权；（5）领事裁判权；（6）陆路通商与沿海贸易权；（7）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8）租界权与租地权；（9）赔款原则与鸦片贸易自由权；（10）传教自由权，等等。

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由此使中国丧失的大量主权，构成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从此外国列强可以凭借条约的规定，从中国得到各种利益。清王朝犹如签订了卖身契的“公司法人”，只要清王朝不垮，外国列强就会永远从这个“法人”得到“条约好处”。其实这既是外国列强之间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的原因，也是列强支持清王朝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原因。由此原因，清王朝便迅速地由一个独立的封建政权，向半殖民地性质的从属政权转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从属资本主义”的道路。“从属资本主义”是相对于“主导型资本主义”而言的，也就是说，在西欧各国形成的资本主义是原发型资本主义，它是在封建的母胎中成长起来的，并由此形成向外扩散的原动力，成为向各落后地区进行征服的主导型资本主义。它们往往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承载者，出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过程中，往往把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或前封建时代的各落后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使之成为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从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毫无例外，被西方列强征服、并强行拽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的近代中国，其走向近代的道路即不可能是纯粹的封建社会又不可能是独立

发展的资本主义，而只能是附庸于世界列强的“从属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色。其具体表现是政治上从属，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即其标志；经济上的从属，中国只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文化上从属，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以学习和移植吸收西方文化为主。总之，从属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它既是屈辱也是进步，由于近代中国转型期所处的屈辱性，所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争取民族独立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改变近代中国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从属性”而战的。中国，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的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其把重点放在反抗列强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的自主独立方面，也应当看成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从属性”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3. 民族忧患意识的强化

忧患意识本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一种精神品质，是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交织着忧患和觉醒的历史。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迫局面，使得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比以往任何时代却显得更强烈、持久、深刻。外敌入侵的隆隆炮声，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严酷现实，迫使知识分子从皓首穷经的封建学术牢笼里跳出来，寻求“炼石补天”之术。从“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开始，一些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的“经世致用”的主张，曾经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折关头，“大忧”、“大患”、“忧患”等字

眼，多次出现在龚自珍的笔下。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清王朝的腐败和“衰世”而产生的话，那么，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的刺激而勃发。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就明示自己的创作动机：一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为“忧患与发愤”。“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心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者所宜讲划也”。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为一种精神动力，靠着它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进而才能讲求攻夷、制夷之道。这里魏源也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的根由，也多由愤悱、忧患而产生。稍晚些的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无不从忧患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著书立说，探讨救亡良策。

近代中国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每添一份灾难，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就多添一份忧患，救亡图存运动就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刺激和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巨大的忧患意识，谭嗣同就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伤时之言。康有为、梁启超受国家民族被宰割的刺激，也高声疾呼，历数中国所处的险恶处境，唤起国人的觉醒。戊戌变法后崛起的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阶级，但激励他们走上救亡启蒙之路的“原始冲动”，仍然是他们思考国家民族的现实前景而产生的忧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济世思想的体现。

总而言之，西方的侵略所导致的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是强化中国人忧患意识的重要历史前提。反过来，中国人忧患意识越深，危机意识越强，那么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也就愈加得以扩张，越容易形成高潮。纵观中国近代史，中国的思想启蒙无一不是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开展的。列强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先进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他们以

先觉者的姿态向国人传递中国现实处境的信息，唤起国人的觉醒，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蔚然壮观的思想启蒙运动。

二、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展

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发轫于洋务后期形成的洋务知识分子（也称早期维新派），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并跨越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1. 在列强侵略和西欧近代启蒙思想双重作用下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启蒙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主要是指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诞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德国的康德、费希特等人。概括地讲，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构成：

（1）倡导天赋人权说，认为人人生来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2）主张社会契约论，强调人们为了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天赋权利，通过契约成立政府，政府则“由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正当的权利”。同时，人们在订立契约成立政府时，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只是使这些权利由于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更加安全。如果政府损害了人们的权利，实行暴政，那么，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另成立新的政府。

（3）为了对统治者的权利进行限制，防止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分离、分立。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人们在拥有自己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应有按比例纳税的同等义务。

总之，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为旗帜，以自然法、契约论为理论武器，无畏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猛烈进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成为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前导。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国家的确立而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作为人类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产生的精神文化财富，却随着资本主义向欧洲以外国家的征服和扩张而传播，成为后进国家的思想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争取人的解放，建立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理论武器。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都是在两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列强坚船利炮威逼下民族危机意识勃发的局势中发生的。这点，与西方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自发地孕育产生于封建社会解体之时，并进而传播扩散，形成一个推动整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运动不同，它是在外力的催化下、西方思想的启发下开展的。因此，中日两国的启蒙思想都直接借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精华，作为对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对外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理论武器。而且他们在使命上完全服务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要求。

2. 启蒙政治团体倡导并推动近代的启蒙运动

中日两国在开展启蒙运动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启蒙团体，并且都为各自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进步服务。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虽然发轫于洋务运动后期的早期维新派，但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范畴的却是开始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启蒙团体。由于近代中国一直伴随着民族的生存危机，并且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